

论苏李诗文的形成机制与产生年代

——兼及《汉书·苏武李陵传》的成篇问题

孙尚勇

结合敦煌遗书所见与苏武、李陵相关的写本文献，参考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大致可以确定，苏李诗与传世苏李书信文一样，最早都是依托于某一敷衍苏武、李陵故事的表演艺术节目。这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脱离了苏李故事而得以写定，于是出现后来的苏李诗。唯其如此，传世苏李诗在文本上表现出来的诸多疑问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通过对苏李书信文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推测，苏李诗和苏李书信文所依托的苏李故事产生于西汉末年。《汉书·苏武李陵传》的成篇当与此故事之流行相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乐府通论”（批准号 17XZW006）阶段性成果

苏李诗主要有两组：一组七首，见载《文选》卷二九；另一组十首，见载《古文苑》卷四。逯钦立又辑得苏李佚诗约四首散句，连同《文选》和《古文苑》所载十七首，总题作“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录入《汉诗》卷一二^①。本文讨论的苏李诗以《文选》所录七首为主，连带涉及的苏李书信文则以《文选》、《艺文类聚》所录为据。

苏李诗，一般多认为是无名氏托名李陵、苏武写成的。但在这一前提之下，历来相关研究却陷入了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预先认定成熟的五言诗不可能产生于西汉，进而主要依靠诗歌文字层面的证据，判定苏李诗产生在汉末、曹魏或西晋末年^②。第二个误区是，预先认定苏李诗乃至苏李书信文一定晚于《汉书·苏武李陵传》，进而确定这些作品属托名或拟作^③。笔者认为，要推进苏李诗研究的进展，必须走出以上两个误区，摆脱某些思维定式的不利影响。本文大体认同苏李诗乃托名李陵、苏武这一传统看法，但并不预先否定苏李诗产生于西汉中后期的可能性^④，本文亦赞同研究苏李诗必须联系《汉书》有关记载的传统做法，但同样并不预先肯定苏李诗一定晚于《汉书·苏武李陵传》。

鉴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初步解决苏李诗这一学术公案，必须从回答以下这一疑问开始：既然苏李诗的作者不可能是李陵、苏武，那么，为什么在诸多文献记载中，它们总是与李陵、苏武相联系呢？

—

事实上,明末清初人叶矫然已经对上述疑问有所察觉,其《龙性堂诗话初集》曰:“苏、李《录别诗》,或云已作,或云拟作,今不必深辩,总是叙述两人同在塞外时,武奉诏还阙,陵留滞北庭,临歧握别,真有难为情者。”^⑤所论隐约指出了苏李诗的故事特性,甚为通达,见识卓越。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敦煌写本被发现的因缘,胡适和傅斯年更是解决了人们关于苏李诗的部分疑问。胡适《白话文学史》说:“旧时相传汉武帝时的枚乘、李陵、苏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诗。这种传说,大概不可靠。李陵、苏武的故事流传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传说,近年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也有李陵答苏武书,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孙权的典故!大概现存的苏、李赠答诗文同出于这一类的传说故事,虽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⑥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首先分析了五言诗何以托名李陵名下的表演艺术背景:“鸣沙山石室发见文卷中就存巴黎之一部而论,什七八为佛经及其他外国文籍,中国自著文籍不过什之一,而其中已有关于苏李故事者四五篇(记忆如此,不获据目录校之),可见李陵的故事在唐五代还是在民间很流行的……李陵故事流传之长久及普遍,至今可以想见,而就这物事为题目的文学出产品,当然不少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是一个民间文学出产品)。即如苏李往来书,敦煌石室出了好几首,其中有一个苏武是大骂李陵(已是故事的伦理化),有一条骂他智不如孙权……大约自汉以及六朝,民间传说李陵、苏武的故事时,有些歌调,咏叙这事……所以当时必有很多李陵的诗,苏武的诗,如平话中的‘有诗为证’……如果这段故事敷衍得长了,也许吸收若干当时民间的歌调,而成一段一段的状态,所以无名氏的别妻诗成了苏武的别妻诗。”^⑦作者紧接着分析了苏李诗托名李陵、苏武的社会文化原因:

何以李陵故事这样流行,也有一层道理,即李陵的一生纵使不加文饰也是一段可泣可咏的事实。李氏本是陇西士族,当时士大夫之望,不幸李广那样“数奇”,以不愿对簿而自杀。李陵少年又为甚多人器许,武帝爱他,司马迁那样称赞他:“事亲孝,与士信,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在当时的士人看去,李陵比当时由倖幸倡优出身的大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不可同年语的。偏偏遭际那样不巧,至于“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而李降虏后,还是一个有声色意气的人。有这样的情形,自然可以成为一种故事的题目。苏属国是个完节的人,是个坚忍而无甚声采的人,拿他和李君亲起来,尤其使这故事有声色。天然造成的一个故事资料,所以便如此成就了。^⑧

以上两家论述都援引了相关敦煌资料以为对比,胡适敏锐地指出苏李赠答诗文同出于某类有关苏李的传说故事,傅斯年则详细地分析了苏李诗何以附托于苏李故事流传的理由。参考胡、傅两家的意见,可以推测,苏李诗、文都是苏李故事中的作品,它们附属于有关苏武、李陵的歌唱艺术表演活动。

二

正确理解上述事实,首先需要从苏李诗的内容谈起。逯钦立《汉诗别录》说:“李陵此二十余篇之诗,古代别诗之杂汇也。故颜延年视为‘总杂’,萧子显目为‘离辞’。然此别诗之篇,内容

亦极不一致。有临歧送别之辞,如‘携手上河梁’,‘嘉会难再遇’,‘良时不再至’,‘骨肉缘枝叶’,‘黄鹄一远别’,‘烛烛晨明月’,‘陟彼南山隅’,‘双鳧俱北飞’诸篇是也。有游子自伤之辞,如‘烁烁三星列’,‘晨风鸣北林’,‘钟子歌南音’,‘童童孤生柳’诸篇是也。有征人别妻之作,如‘结发为夫妻’篇,有久别还之作,如‘远送新行客’篇。至于‘寂寂君子坐’,‘炎炎钟山首’,则又作客者称咏主人之辞也。各类诗章,既彼此悬异。而其所咏之情物时地,亦鲜有同者。则此一组别诗,姑不问其是否一人之作,而其非一时一地之产物,则可断言。”^⑨逯氏的意见,大体是立足于建安以后始得确立的文人诗的视角以及文人诗的研究方法所作出的判断。实际上,见载《文选》的苏李诗七首所表现的内容相对集中于相聚分别的离愁别绪。若从表演艺术附属作品的角度来看,同胡、傅二氏所揭敦煌所见李陵故事用孙权典故一样,历来研究者所揭示的苏李诗中时地方面的矛盾均可得到理解。

其次需要联系前人研究苏李诗所及之见载于《文选》卷四一的李陵《答苏武书》,以及《汉书·苏武李陵传》等相关记述,以做综合判断。《答苏武书》通篇以四言句为主,与现存两汉文人的书信文相较,其文体独特。《文选》卷四一至四三所收书信,两汉作者有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惲《报孙会宗书》、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孔融《论盛孝章书》,均不以四言为主,两汉以四言为主的书信唯有冯衍《与妇弟任武达书》^⑩。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曰:“《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⑪苏轼《答刘沔都曹书》踵续刘说云:“陵与武书,词句僂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⑫

《答苏武书》首述塞外寒苦,内心怵怛,次述与匈奴作战及不得已投降的经过,最后批评汉廷寡恩负德。前引所及王琳《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一文认为,《答苏武书》篇首是假托者新创之辞,以下则属刺取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苏武李陵传》而成。前引所及汪春泓《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立论以为,《汉书·苏武传》乃迎合汉中央朝廷为宣扬忠君思想而创作成篇的,故其中所述李陵、苏武故事不具备实录的品格,而苏李二人事实上可能未曾谋面,故依托苏李的诗文之伪托不辨自明。笔者认为,汪氏所论实为欲解决苏李诗文疑案而采取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其论证颇显脱离文本之弊。若谓《汉书·苏武传》在语言情节上有所增饰,似可信从;若谓《苏武传》全篇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向壁虚构,脱离历史事实,似难以信从。不过,汪氏的意见,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苏李诗、文与《苏武李陵传》的关系问题仍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以下拟结合《汉书》中可信赖的资料,对《答苏武书》真伪问题及其中所蕴含的有价值的信息再作一些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关于苏李书信文,除前人研究既有的论述之外,尚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答苏武书》云:“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李善注:“《汉书·武纪》曰:‘天汉二年,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公孙敖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时无五将,未审《陵书》之误,而《武纪》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汉二年到塞外,寻被诏书,责臣不进。臣辄引师前到浚稽山,五将失道。’详此,亦不云其名。”^⑬《汉书·李陵传》:“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坐预诏强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将,出塞不至,令陵见没也。”^⑭据此可知,天汉二年,出征匈奴仅四将,先出者李广利、公孙敖、李陵,后出者路博德,并无“五将”,此亦《答苏武书》与史实严重不符合之例,可证此书非战争亲历者李陵所作。

(二)《答苏武书》云:“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⑮

此语本之《汉书·苏武传》和《燕王旦传》所载旦上疏告霍光事。《苏武传》云：“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光颡权自恣。”^{①⑥}《燕王旦传》载旦上疏云：“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见留二十年不降，还宜为典属国。”^{①⑦}按：典属国，二千石，禄位不可谓微。《苏武传》又云：“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①⑧}苏武因子参预上官桀等“谋反”被免官之后，仍能“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并且宣帝即位“优宠”苏武，也不过“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并未拔擢升职。又刘向《新序·节士》云：“匈奴始言武死，其后汉闻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义，归武。汉尊武为典属国，显异于他臣也。”^{①⑨}故苏武归国后所任之典属国禄位并不低，谓苏武居典属国位微者，不过上官桀等一时之言。《答苏武书》据此为论，颇见牵强。

(三)《答苏武书》云：“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②⑩}此段举汉高帝平城之围以为李陵败降匈奴作解，颇为怪异。揆诸史实，汉甫建立之时正当匈奴最为强盛之日，而李陵之时，匈奴已连续遭卫青、霍去病所率汉军之数次打击，兵力与汉初相去悬远，二者不能并论。若不过多纠缠于当时之人利利害，则李陵败因主要在其以区区五千步卒孤军深入。故《答苏武书》以高帝困于平城作解，颇显不伦，这显然是民间简单类比思维方式的体现。

(四)《答苏武书》云：“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②⑪}此语以母妻家族被戮皆由于李陵之降匈奴。然《汉书·李陵传》则详载云：“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杆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②⑫}这段话交待得很清楚，武帝族灭陵家，在李陵投降一年多以后，其直接原因并非李陵的投降，而是由于李陵“教匈奴为兵”的传闻。《艺文类聚》卷三·录李陵《与苏武书》云：“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余里，虽身降名辱，下计其功，岂足以免老母之命耶？”^{②⑬}两书于武帝族灭陵家的实际经过均只字不提，证明这封书信可能与《汉书·李陵传》不甚相关。

据以上四条所论，托名苏李的书信文与《汉书·苏武李陵传》差异颇大，与苏李事迹不相符合。这些文字与苏李诗表现出相近的特点，情感深沉，有足悲者，而所涉事实均不可致诘，故其创作的民间性显而易见。换言之，与苏李诗一样，苏李书信文中不可致诘之处，若从表演艺术之附属作品的角度来看，同样不成问题，完全可以理解。

上文论及之“五将失道”语，虽与李陵行实不符，却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答苏武书》的大致写作年代。本始二年（前72），汉遣五将军并常惠持节护乌孙兵伐匈奴，三年春正月戊辰出发，事见《汉书·匈奴传上》与《宣帝纪》。夏五月，五将无功而返，仅常惠以乌孙兵大破匈奴右地。虎牙将军田顺、祁连将军田广明因“不至期”和“逗留不进”^{②⑭}，下狱自杀。此当为“五将失道”语之所本。本始三年征匈奴兵罢紧接着就是大旱，《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东西数千里。先是，五将军众二十万征匈奴。”^{②⑮}又《匈奴传下》，哀帝建平四年（前3）扬雄上书论

匈奴事仍以五将之事为说,云:“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⑤足见此次五将征匈奴事,汉人记忆深刻,《答苏武书》中“五将失道”语必与此相关。若此推测不误,则可以确定,苏李书信文创作时间上限不会早于公元前71年,这时李陵已经病逝(前74)三年多了,故书信跟苏李诗一样,与苏李本人并无直接的关联。联系苏李诗和苏李书信文的伤感情绪及其对汉朝政治的批判来看,这批作品当作于西汉末年至新莽初年这一段时间。其创作下限绝不可能晚至魏晋,因为此时人们对“五将失道”已无太多记忆。

三

综合上文,可以确定,苏李诗、文皆附属于某一敷衍苏李故事的演艺节目,其编创者出于民间,而非官方,苏李故事的表演有歌唱的诗,有诵读的文,证明这一节目的表演方式可能为戏剧或讲唱,其产生年代在西汉后期。前揭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的一段话,可借以说明苏李诗脱离苏李故事的形成机制:“这些诗靠这借用的故事流传,后来的学士们爱他,遂又从故事中抽出,而真个成了苏武的诗。此外很显出故事性质的苏李诗,因为文采不艳,只在民间流行,久而丧失。原来古代的文人学士本不了解民间故事及歌曲的性质,看见李陵的故事里有作为李陵口气的五言诗,遂以为李陵作五言诗,但最初也只是将信将疑,后来传久了,然后增加了这一说的威权。”^⑥本文开头所引胡适、傅斯年两书所举敦煌遗书中的苏李书信文,见于S0173、S0785、P2498、P2847、P3692五种写本,各本内容大致相同,原题《李陵与苏武书》、《穷囚苏子卿谨献书于右效王阁下》。除此之外,敦煌遗书所见与李陵、苏武相关的文献中,胡、傅二氏未曾涉及者,还有P3595《苏武李陵执别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14666《李陵变文》两种写本。并且《苏武李陵执别词》又有李陵苏武诗各一首:“凉风趁□烟,旅雁远思边。苏武归南国,虽陵何负天!羡他失伴鸟,塞北独连蕃(翻)。汉军日(君白)云下,咸阳路几千。”“劝君所赐酒,过后为君愁。欲知相忆处,思君□水头。有时无雁翼,群臣并是忧。”^⑦这两首诗与苏李诗之间在艺术上的工拙与否可置不论,就抒情情调来说,它们与苏李诗无疑是相通的。S0173等七种敦煌写本大约属于同一个苏李故事表演的文本,其内容的共性在于它们与《汉书·苏武李陵传》的历史记载大不相同,它们都是韵散相间的文本,表达了对李陵遭际的极大同情。这些写本与较早的苏李诗、文的性质极为接近,它们可以进一步证明,本文关于苏李诗、文皆附属于某一敷衍苏李故事的演艺节目的结论是可信的。换言之,本文所讨论的苏李诗、文依托的苏李故事,当是敦煌遗书所见苏李故事表演的渊源所在。

本文有关苏李诗形成机制和产生年代的讨论,还可联系前揭汪春泓有关《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的研究来作进一步思考。何寄澎虽同意汪春泓《汉书·苏武李陵传》目的在于宣扬忠君思想的观点,但他郑重指出:“班固所塑造的李陵形象绝非负面,也绝不可简单地视为苏武形象的反面对照。”^⑧笔者认为,霍光与宣帝之重视苏武这一行为本身便足以代表前汉朝廷对“忠君”观的大力提倡,这一提倡亦足以在当时形成巨大的影响,并不需要等到百余年后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撰写《汉书·苏武李陵传》再加揄扬。苏李书信文、苏李诗所反映出的对李陵的极大同情与官方对苏武忠君行为的大力提倡大异其趣。可以说,在同情李陵遭际这一点上,《汉书·苏武李陵传》与苏李书信文、苏李诗是相通的。就此而言,《汉书》有关苏武、李陵事迹的写作极有可能借鉴了自西汉后期开始在民间流传的苏李故事。

- ①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6页。
- ② 相关研究，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科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2—423页。
- ③ 汪春泓：《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
- ④ 《文心雕龙·哀吊》：“暨汉武封禅，而霍嬭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林其锁、陈凤金：《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67页。）据刘勰之说，汉武帝为霍嬭所作之哀伤歌诗为五言体。只此一条便可有力地证明，西汉武帝时期，五言诗体已经开始流行。
- ⑤ 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60页。
- ⑥ 《胡适文集》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 ⑦⑧②⑦ 《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第130页，第129页。
- ⑨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73—274页。
- ⑩ 《答苏武书》四言问题，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书〉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王琳《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皆有论述，前文认为西汉文人亦多用四言，后文据以判定《答苏武书》为汉末魏晋人所假托。
- ⑪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5页。
- ⑫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9页。
- ⑬⑮②②① 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8—1849页，第1853页，第1850页，第1848页。
- ⑭⑯⑰⑱⑲⑳㉑㉒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7页，第2467页，第2755页，第2468页，第2457页，第3786页，第1393页，第3814页。
- ⑲ 赵仲邑：《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235页。
- ㉓ 《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页。
- ㉔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49—1750页。
- ㉕ 何寄澎：《〈汉书〉李陵书写的深层意涵》，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山木